



新时期 中国社会史学

HISTORY



社会史丛书

常建华——著

史学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改革开放
40年
研究丛书

新时期 中国社会史学

HISTORY



社会史丛书

常建华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学 / 常建华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10
(社会史丛书. 改革开放四十年研究丛书)
ISBN 978-7-201-13960-9

I. ①新… II. ①常… III. ①社会史学-学科发展-
概况-中国-现代 IV. ①K02-12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6029 号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学

XINSHIQI ZHONGGUO SHEHUI SHIXUE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韩玉霞
特约编辑 李佩俊
封面设计  明轩文化 · 王 烨
TEL: 123674746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4
插 页 2
字 数 4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2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社会史学的足迹（代序）

作为现代史学的社会史研究，在中国诞生于20世纪初，至今已经百余年，其学术演变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20世纪前50年，50至70年代的30年，80年代至今的近40年。海外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虽不与中国同步，但是在这些阶段也有较大的变化。我们以时间为序探讨不同时期人们对于社会史的认识以及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介绍以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为主，兼及海外的研究状况。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之作，是梁启超的《新史学》。1901年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新史学不是写“一人一家之谱牒”，而“必探索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翌年又以“新史学”为题，批评中国之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十四史为“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因此他号召掀起“史界革命”。他认为，历史叙述人群进化现象，求其公理公例，指出社会科学皆与史学有直接关系。梁启超提倡历史学要研究国家、群体的进化，主张历史研究对象从朝廷移向人民群众，要借鉴其他社会科学，这些认识具有打破政治史一统天下，将人类社会各种活动进行专门化、综合性研究的创新意义。梁氏这种历史研究对象和方法迥异千古的新史学，也正是直到今天社会史研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梁启超之所以能够提出上述振聋发聩的看法，是受到海外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然而其标榜新史学甚至还早于欧美。1911

年美国学者鲁宾逊也出版了名为《新史学》的著作，批评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病，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并且将重点放在日常生活的主要方面；历史应该融会广义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方面的知识，用综合的观点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用进化的眼光考察历史变化，把人类历史看成是逐渐发展的过程等。梁启超的“新史学”比鲁宾逊早了大约十年。也就是说，20世纪初中国兴起的现代新史学观念比起西方并不落下风。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于中国。李大钊于1919年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翌年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运用唯物史论改造旧中国传统史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奠基。五四运动前后，人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社会学，视历史为社会发展史，从总体上探讨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变迁，深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演进理论和进化论的影响。

1927年国共分裂，国民党清党，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部，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产生了激烈争论。1928年中共六大检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托派则认为中国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是革命的对象。1927年《新生命》在上海创刊，国民党理论家陶希圣著文，认为战国以来中国一直就是士大夫阶级统治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党派由选择中国革命道路引起对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进而产生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认识，形成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这场论战为全面研究中国社会史提供了契机。社会史大论战讨论的问题主要有四个：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阶段、什么是“封建社会”以及中国历史的断限和特征、

什么是“商业资本主义”或“前资本主义社会”。概言之，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探讨，属于社会形态史、社会发展史。这场论战把“社会史”作为历史研究的主流，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社会史学。

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的代表性著作，探讨了商周的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开创了先秦社会史研究的新局面。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前书是第一部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原始社会的专书；后书首次提出殷商为奴隶社会，西周是初期封建制，秦以后发展为专制主义封建制。后书影响久远。40年代留学法国回国的侯外庐，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社会史》，在亚细亚生产方式、文明路径等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见解。

社会史论战基本上属于以论代史的政论之争。陶希圣于1934年12月创办《食货》杂志，如其副题“中国社会史专攻”所示，是社会史专刊，希望推动学者搜集社会史料，进行深入的历史研究。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食货》因此停刊，其存在两年半发行61期，发表了340篇论文，探讨社会经济问题，陶希圣、鞠清远、杨中一、何兹全、武仙卿、全汉升借助《食货》探讨许多新问题，培养了不少学者，该刊在中国社会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社会史研究

50年代以后的中国，历史研究重点探讨“五朵金花”，即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历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和资本主义萌芽。后四个问题均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史有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沿袭社会史大论战，以解决社会形态的演进问题；二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为通史研究中涉及的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讨

论实质,在于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性质。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是为了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解释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印证中国革命的道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争论的,是萌芽出现的时代及其定义、出现的经济部门、发展的程度及对阶级关系的影响、发展缓慢的原因。

上述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传统社会形态、性质及其发展的认识,也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如对先秦社会性质的认识离不开讨论血缘组织,50年代张政烺、李学勤进行了可贵的探讨。在历史分期问题上,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1991)系统提出魏晋封建说。再如农民战争史,基本上搞清了历代农民运动的状况,农民战争史与秘密宗教关系的讨论推动了秘密社会的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促进了对明清社会变迁的认识,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1956)、《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具有开创性。在土地所有制的讨论中,产生了一批实证性成果。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关键点是东方社会的特点和封建社会长期性的关系。如认为地缘关系与血缘关系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公社长期存在,既是东方的特征之一,也是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八九十年代问世但实际是在六七十年代进行研究的几部著作,如俞伟超《中国古代公社组织的考察——论先秦两汉的单一—弹》(1988)、柯昌基《中国古代农村公社史》(1989)、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1992)就是这方面的研究。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1979)提出的很多问题具有启发性。

在诠释经典理论和以阶级斗争治史的潮流中,也有部分史学家保持历史主义的治史态度,充分占有史料并独立思考,从事创造性的社会史研究,如杨宽的《古史新探》(1965)、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1955)及其《续编》(1959)等就是代表。

欧美社会史研究受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思想影响很大,一

般来说对于社会史有广义、狭义的理解：狭义的社会史以社会群体为主，在历史整体中理解社会群体；广义的社会史更重视社会结构，强调社会各系统之间的联系。总体的社会史是重视解释一般历史进程的综合性的史学体系，20世纪70年代成为西方中国史研究的主流，社会史也往往与政治史、军事史结合在一起。“社会史滥觞之后的各种专史都有所变化，社会史作为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被广泛接受。”^①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在二战后迅速发展，受汉学家费正清的影响，中国史研究重视社会结构与区域研究。斯坦福大学的人类学家施坚雅投身史学研究，对于区域研究贡献重大，影响深远，施坚雅的论文《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1964），及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1977），就是区域研究的著名成果。在哈佛大学，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1966），探讨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地区各阶层的活动。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1980），研究19世纪中国地方政权普遍军事化的问题。另一个汉学研究中心华盛顿大学重视汉魏史的研究，1972年出版了中国留美学者瞿同祖的《汉代社会结构》，1980年刊行许倬云的《汉代农业》，前者宏观探讨社会构成，后者量化研究汉代佃农、自耕农的数量与农民日常生活的费用，很有价值。留美的中国学者何炳棣成就卓著，他的论文《扬州盐商：18世纪中国商业资本主义研究》（1954）、专著《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1959）、专著《明清社会史论》（1962）影响深远，特别是《明清社会史论》继续美国学者艾博华《传统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研究，探讨明清时期科举制给士阶层带来的向上社会流动。许倬云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也进行研究，于1962年出版了建立在统计分析基础之上的研究成果。张仲礼是研究绅士贡献突出的另

^① 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274页，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年。

一位华裔学者,他的著作是《中国绅士》(1955)、《中国绅士的收入》(1962)。萧公权的《19世纪中国乡村的政治控制》(1960)研究了里甲、保甲、乡约制度的来源、演变。70年代末,美国两位年轻学者对于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引人注目,此即姜士彬的《中世纪中国的寡头政治》(1977),与伊沛霞的《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1978),他们采用的个案研究方法是社会史研究领域重要的方法。

二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如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1976)提出的共同体理论,用以解释中国中世农民与地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十年的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走上了振兴之路。历史学界的拨乱反正是以重新思考阶级问题为突破口的,1983年、1985年分别召开了“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和“中外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比较研究讨论会”,突破了阶级分析是认识封建社会唯一方法的观念,把认识社会的目光指向多种社会关系、社会群体和社会生活。这时出现了一批阶级研究的成果,这些著作多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总结,资料扎实,如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1985)和《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1988)、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1996)、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1996)、韩大成《明代社会经济初探》(1986)、经君健《清代社会的贱民制度》(1993)等。

1986年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之年,冯尔康、乔志强、王玉波相继撰文,倡导开展社会史研究。1986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举行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从学科的角度对社会史进行了讨论,把研究的视角指向人民大众的生活。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在

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主要体现在断代的社会史、社会群体及其结构、社会组织、地域社会、人口社会史、社会习尚和以社会为视角的其他研究方面。还历史以血肉的社会生活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社会文化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的区域社会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三大特征。

新时期中国社会史学出版了一批成果。在综合性研究方面，有王子今《秦汉社会史论考》（2006）、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2005）、冯尔康《顾真斋文丛》（2003）与《中国社会史研究》（2010）、王家范《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2001）、李长莉等《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2015）、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等。特别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推出“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书系（1996年至今），学术质量较高。21世纪以来，生活史更受重视，熊月之主编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从2008年起陆续推出二十多种，内容丰富多彩。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有向日常生活史转变的趋势，重要的著作有黄正健《走进日常：唐代生活考论》（2016）、宋立中《闲雅与浮华——明清江南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2010）等。

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取得了诸多成就。社会群体方面，士大夫、商人、妇女研究产生了一批成果，对以年龄划分的社会群体如儿童、老人的研究有所开展，出现了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1993）和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2000）等优秀作品。社会组织方面，家庭史得以开展，家族、宗族是最富成果的领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组织的“家庭、家族、宗族研究系列”（2005）、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2007），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秘密宗教结社与会党的研究多有力作，如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1987）及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1992）等。会社的研究获得新的进展。历史人口学成为热点，人口流动、人口地理以及人口行为受人关注，郭松义《清代社会环境和人口行为》（2012）为代表性研究。民

俗习尚反映了多方面的社会生活,也是社会心态的反映,新时期对于历史上风俗、民俗、礼俗的探讨注意到揭示其与民众意识、民间信仰、社会心理的联系性,如彭卫《汉代社会风尚研究》(1998)、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2008)、郑振满与陈春声主编的《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2003),就是这方面的著作。婚姻、丧葬、岁时节日的研究较多,重要著作有张邦炜《宋代婚姻家族史论》(2003)、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2000)、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2000)与《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2003)。以社会为视角的其他研究,如医疗社会史、法制社会史、灾害社会史、水利社会史等引人注目,钱杭《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2009)、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2009)、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2007)、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2003),是这些方面的代表性研究,邹逸麟主编“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2008)则是综合性研究成果。近期社会文化史颇受关注。

社会史研究强调整体观,但是宏大叙事下的社会史很难把握历史的整体性,整体历史也只能在区域史中落实。社会史研究多采取地域社会史的研究视角。现在众多的社会史研究者树立了从地域社会入手的研究理念,认为地域是认识中国历史的有效途径。在地域社会的研究中,地域史的层次性问题已经引起注意。无论是乡村社会史还是城市社会史,都取得很大成绩。尤其是受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影响,开展了村落社区的研究,形成历史人类学的学术特色。不同区域的社会史具有系列性的研究成果。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主编的“历史·田野丛书”,集中体现了这样的学术追求,其中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2006)、郑振满《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2009),反映了这些方面的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的探讨。赵世瑜新著《在空间中理解时间:区域社会史的理念与方法》

（2017）强调人类学视角下区域社会的探讨。

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史研究活跃。突出表现在医疗社会史方面，中华书局推出的“生命医疗史系列”（2012）收录了李建民《从医疗看中国史》、林富士《中国中古时期的宗教与医疗》、李贞德《性别、身体与医疗》、李尚仁《帝国与现代医学》，此外，梁其姿《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与组织》（2012）属于标志性成果。此外，法制社会史成果也很突出，如柳立言《宋代的宗教、身分与司法》（2011）、赖惠敏《但问旗民：清代的法律与社会》（2007）。断代史领域都有专门的社会史研究，如许倬云、杜正胜研究先秦社会，邢义田、蒲慕州研究秦汉社会，毛汉光、陈弱水研究中古社会，萧启庆对元代士人与社会的深入研究，徐泓倡导明清社会风气与城市研究影响较大。宋明时期社会的集体研究较为突出，宋代家族研究产生了一批成果，如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2001）、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2008）、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2009）等，明清则以研究物质文化或日常生活为特色，熊秉真主持的“近世中国的物质、消费与文化”（2003）计划、王汎森与李孝悌先后主持的“明清的社会与生活”（2001）、“明清的城市文化与生活”（2006）两项计划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清社会史的一批成果值得注意，如熊秉真《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1995）、李孝悌《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与生活》（2007）、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2007）与《优游坊厢：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闲消费与空间变迁》（2013）等。

欧美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标新立异。宋代社会史研究很活跃，罗伯特·海默斯《政治家与绅士：北宋和南宋时期江西抚州的社会精英》（1986），继续了西方绅士研究的传统，但是他不以中举与当官作为唯一标准，而是选出七类人物作为“抚州精英”，引发了何谓“地方精英”的持续性讨论。个案研究则有琳达·沃尔顿《宋代中国的亲属关系、婚姻和身份：宁波楼氏个案研究》

(1985)、戴仁柱《中国宋朝的宫廷与家族：明州史氏的政治成就与家族命运》(1986)等，关注婚姻、家族、身份及其构成的社会网络与社会流动问题。综合了性别史、身体史、生活史、医疗史乃至科技史的女性史研究尤其引人注目，江苏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女性系列”，收入了伊沛霞、费侠莉、白馥兰、曼素恩、高彦颐、贺萧等学者优秀的著作。城市史的研究也有佳作，美国学者韩书瑞著《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2000)视角独特，呈现了城市认同的过程。近年来欧美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紧密结合，深入日常生活领域，重视物质文化与科技的生活性，强调知识的传播，出版了一些新颖的著作，代表作有艾约博《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2009)、高彦颐《砚台的社会生命：清初的工匠与学者》(2017)。英国学者柯律格的明代艺术社会史的研究别开生面，如《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1991)、《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2004)、《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2013)等。

日本学界的中国地域社会研究颇具特色。1981年名古屋大学教授森正夫发表《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视点——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与领导者)基调报告》，倡导地域社会研究，指出由共同领导者统治下被整合的地域场所称作地域社会。地域社会论的提出，意在摆脱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学说的理论困境，他受到了共同体论、乡绅论的启发，吸取了社会史、结构主义理论方法。地域社会研究在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具体的重要成果。如山田贤《移民的秩序：清代四川地域社会史研究》(1994)、岸本美绪《明清交替时期的江南社会：17世纪中国的秩序问题》(1999)、滨岛敦俊《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2001)、三木聪《明清福建农村社会的研究》(2002)等。此外，川胜守《中国城郭都市社会史研究》(2004)也颇值得注意。近来日本的社会史研究更加多元化，宋史研究对于社

会空间与信息交流感兴趣，不同时期的城市社会史、法制社会史的研究取向比较鲜明，新作如夫马进主编《中国诉讼社会史的研究》（2011）、山本英史编《中国近世的规范和秩序》（2014）等。

本书的内容构成与来源

本书内容出自笔者不同时期对于中国社会史理论与实践的探讨，既有民国以来现代学术史的追溯，更有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每十年的学术研究综述。

本书主体的三章，依照时间顺序将中国社会史复兴后的研究按照三个十年划分而成，内容依据我写的以下学术评述而成。第一章第一节，出自《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二节出自《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第三部分（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二章依据《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其中第一节、第三节新增了小题目以划分内容；第三章第一节，为《开放与多元：新世纪中国社会史理论探讨与学科建设》（《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一文的完整版，第二节、第三节出自《新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8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7年）。导论中的三节，所依据的书刊如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酝酿”主要出自《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中国社会史研究四十年”为《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2期）的全本，保留了更多的有关近现代社会史的内容，“日常生活史的视野”为《中国日常生活史读本》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至于代序《社会史学的足迹》主要内容的前三部分，系《中国社会史经典精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前言增写而成。

每十年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状况的追踪，自然形成了本书的主

体内容，可谓水到渠成。本书一时合成，然而经过了30年的观察与思考，甚至可以说写了二三十年。

由于本书的内容成于不同时期，行文风格未必完全一致，加之导论又系概括而成，个别内容略有一些重复；此外，文中出现的“近年来”“目前”等时间的表述，均以该文发表时间为准。以上是需要读者谅解的。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酝酿	1
一、阶级问题的重新思考	1
二、走向社会生活的深处	3
第二节 中国社会史研究四十年	6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脉络	6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14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17
第三节 日常生活史的视野	23
一、欧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24
二、海外学者对中国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29
三、中国学者对日常生活史研究的探索	33

第一章 发轫：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 47

第一节 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47

一、社会生活研究：还历史以血肉47

二、社会文化研究：揭示社会精神面貌55

三、区域社会研究：置社会史于地理空间59

四、社会史理论讨论的三个问题64

五、重提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71

第二节 具体问题研究的成果 75

一、断代史、通史研究75

二、社会群体及其结构77

三、社会组织82

四、地域社会86

五、人口社会史89

六、社会习尚91

七、以社会为视角的其他研究97

第三节 结语 98

第二章 成长：跨世纪的中国社会史研究 101

第一节 社会史理论：开放性与多元化 102

一、社会史理论的求新 102

二、对区域社会史的质疑 108

三、社会史新趋势与社会史史料学 115

第二节 社会史研究：探索与收获 118